

人、岁月、生活

爱
伦
堡
著



我宛如杜·伯雷所描写的一只离群的羔羊：要知道我离开俄国的时候，还不足十八岁呢。我就象一个预备班的学生，准备从头学起；我见人就问，出了什么事，但回答只有一句：“这谁也搞不清楚……”我曾试图和别人促膝长谈——谈俄国的使命，谈西方的腐朽，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人们却忙于其他的事：他们不是在谈话，而是在谩骂、诅咒——有的骂布尔什维克，有的骂克伦斯基，有的骂革命。

在芬兰车站，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上了年纪的女孟什维克来迎接我们；她对我说：“跟我来吧。”我回答说，有卫兵在押送我。她就开始骂那个士兵，士兵也回骂她。她对他說，他是一个“背口袋的”（他的确背着一个小包），但他回敬說，她大概只曉得“吃果冻”。我站在那里颇为惊讶。女孟什维克把我们带到一个宿舍里：那里又挤又黑。一个小伙子对他旁边的一个人叫道：“你算什么革命家？你是刽子手，该把你拉去枪毙！……”

我和所有的政治侨民一样，被批准延期服兵役；军区

的一位陸軍中尉說，軍隊里即使沒有我，饒舌鬼已經够多的了。

我在《交易所》編輯部領了我應得的一筆稿費后，就到莫伊卡的一所帶家具出租的公寓中去了。我一大清早就在街上閑逛和觀望。城市的建築和它的馬路在我看來都異常清晰而輝煌，但要了解一點什麼卻不可能。

我到契尼杰利馬戲場去參加一個大會。那里人山人海，但我立刻感覺到所有的人對演說都厭倦了；最初幾個月的那種熱情顯然已經涸竭，甚至空談家們也言盡辭窮了。演說者都是臨時登台的。一位白髮蒼蒼的太太在論證世界語能拯救革命；大家不聽她的。後來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發表演說，他說現在必須立即取消國家；大家一齊向他喊叫；這時他就絕望地吹起口哨來了，於是人們便把他從臨時用木板搭成的講台上拖了下來。一位服飾優雅的年輕人懇求不要把俄國送給德皇。兩個士兵向他衝過去說：“可是你這畜生蹲過戰壕嗎？……”

我試圖尋找和我通信的那些詩人；但是他們沒有一個呆在城里，人們回答我說，他們不是“在郊外避暑”，就是“在克里米亞”。吉·伊·索羅金有一次打發人來請我：“來吧，布洛克在此。”我立刻向冬宮奔去，但到得太遲了——布洛克已經走了。我就這樣錯過了看見那写下了我最喜愛的詩句的詩人的機會……

《交易所》里的人勸我到“維也納”飯店去——詩人們

和画家們每晚在那里聚会。我断定“維也納”定是一个近似“洛东达”的地方。但是坐在小桌旁边的却是一些市民、軍官、投机商人。有一个人叫道：“要是沒有这件事，你們在卡片上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你們还是去把尼古拉枪毙了吧！”一位太太尖声叫道：“他們为什么把列宁給放走了？……”

大街上在抓逃兵；那些檢驗人們证件的巡邏队自己也象是逃兵。一天我目睹两名軍官从一个女人那里搶走了一小袋沙糖。她哭訴着說：“恶棍！……”她走后，一个軍官对着她的背影喊叫着說，她很快要被枪毙的，——当时克倫斯基纵容“背口袋的”，但他自己不久也受到了管束。后来軍官們就恬不知耻地当着行人把臟物瓜分了。

商店里可以买到哈瓦那的雪茄、塞佛尔的花瓶、德·諾亚伯爵夫人的詩集。糖果鋪出售加蜜的咖啡（糖已經沒有了），薄薄的白面包片夹果酱代替了甜点心。馬車夫不再議論燕麦，而只是垂头丧气地詛咒。我在《交易所》編輯部認識的一个詩人說：“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科尔尼洛夫將軍身上。他名叫拉甫尔——这是有象征意义的①……”

士兵們談論着“停战”。逃兵們沉默不語，忧郁地打量着行人。涅夫斯基大街上走动着一些穿軍装的姑娘；

① 俄語“拉甫尔”一詞有榮譽、成功、勝利等意思。

她們英姿颯爽、胸脯高聳；她們正在薩多瓦街的拐角上“開大會”，口中嚷着，必須找到列寧，目前先把切爾諾夫暫時看管起來。

我聽過切爾諾夫的演說。他曾在巴黎發表過十分高尚的談話。但是在三月里曾感動過我的他，到了八月卻變成了一個可笑的人物。他擅長辭令，而且一般說來，很像一個法國激進社會黨黨員，這種人常向選民起誓，如果他被選上，他一定要在河上修建一座橋梁。切爾諾夫發誓說，他要把土地分給農民，還要把俄羅斯從德國人的魔掌中拯救出來。他有一雙狡猾的眼睛；我覺得凡是聽過他的演說的人沒有一個相信他。我也聽過克倫斯基的演說；那就象是在演戲——臨時政府的首腦似乎馬上就要啼哭起來或從台上跑下來。克倫斯基的聲譽當時業已低落；但依然有幾十個婦女拚命號叫，其中的一個還向他擲了一束半枯的翠菊表示敬意；他拾起了花，而且不知何故還嗅了一嗅。

我遇見了兩三個我在巴黎認識的僑民。其中有一個布爾什維克（名叫薩舒尼亞），他說，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被關在克烈斯泰監獄里，孟什維克是叛徒，爭論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問他是否耽心德國人會乘內戰之機侵占彼得格勒。他嚷了起來，說我的論斷和孟什維克如出一轍，說我“從頭到腳”都是一個知識分子，“知識界步調混亂”，現在可怕的不是德國人，而是“護國派”。

我同薩文科夫聊了一兩個鐘頭。他當了國防部長助理，我簡直認不出那個在“洛東達”里陰郁地微笑的鮑里斯·維克托洛維奇來了。薩文科夫大談严厉措施、專政、秩序。他說克倫斯基是一個被自己的嗓音所陶醉的空談家；談到臨時政府的時候，他輕蔑地說：“那是一幫六神無主的人，他們開會的時候不是坐着，而是站着……”

我在冬宮看見了沙皇的飲食起居；他的生活是索然寡趣的；房間里陳設着單調乏味的家具、庸俗的小擺設。（後來我又在北京的皇宮和中國的末代皇帝的內室里看到過這些東西。）在一些軟椅中間擺着一些行軍床；步槍到處皆是，——薩文科夫打算預先埋葬掉的革命正在冬宮的大廳里徘徊。在樓梯上有一個太太抓住了國防部長助理的衣襟。“您得告訴我，為什麼要把若爾什關進牢里？他還在高等法政學校里讀赫爾岑的著作吶……”

薩文科夫向我介紹了弗·阿·斯捷朋。我知道斯捷朋是一個哲學家，他曾寫過一本名叫《一個准尉的書信》的有趣的書，他在書中對戰爭作了赤裸裸的描寫，而沒有給它鍍上一層必不可少的黃金。我很难想象他正在擔任國防部政治部部長的職務。他的臉非常象一個幻想家或一個新教的牧師。我便開始象對薩舒尼亞那樣糊里糊塗而又十分熱烈地肯定說，德國人會侵犯俄國并把革命鎮壓下去。他問我是否想當軍事委員。我微笑了一下——委員必須了解形勢并向別人解釋，而我却忙着一件事——

向所有的人打听。

我还去过斯莫尔尼。在那里人們向奇海澤展开猛烈攻击，他們嚷着說，薩文科夫正在和將軍們協商，而工人們却被关进了監獄。走廊上睡着許多士兵。

有一个来自巴黎的侨民十分严厉地对我說：“这里可不是你的‘洛东达’——到前綫去吧……”我回答說，軍队里不願接受我。他恶狠狠地笑了起来：“这就是說，你是一个布尔什維克？我要檢舉你……”一个老太婆把我推到一堵牆上，哭着說：“你去告訴他們，安德留沙有一个女儿在音乐学院，而这块呢子是米舒金弄到的……”

吉洪·伊凡諾維奇·索罗金和卡嘉带着我的女儿伊琳娜当时正在彼得格勒。他們住在卡嘉的父亲家里；卡嘉的父亲听不得我的名字；除了其他的罪孽以外，首先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卡嘉瞞着父亲把伊琳娜給我带来了；小姑娘当时是六岁。我把她帶到“安庇尔”咖啡館里，請她吃抹着果醬的白面包。后来我們就在涅夫斯基大街上散步。伊琳娜一度曾有一位意大利的保姆，她教会了她祈禱上帝。小姑娘要求我帶她到喀山大教堂去；一进教堂她馬上跪了下来，并命令我也学她的样子。我不答应。伊琳娜嚷了起来，哭个不停；正在教堂祈禱的妇女們生气了：在圣地欺負一个小孩子是可耻的！幸而伊琳娜对祈禱厌倦了，她問我，是不是不能再到糖果鋪去啦。

吉洪告訴我說，斯捷朋派他到高加索前綫去，还想让

我当吉洪的助手。我笑了好久：吉洪对形势的了解比我还不如。他很熟悉弗拉基米尔·索洛維約夫^①的著作和早期哥特式的建筑。真有意思，他将対士兵們談些什么呢：是談“永恒的女性”还是談沙特尔大教堂玻璃窗上的图画呢？

（我曾在档案庫发现一九一七年九月国防部签署的一份委任书，上面写道：“根据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維埃全俄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前綫委员会的决定”，我被任命为高加索军区軍事委員的助理。当时我在雅尔达，而当我知道这个任命的时候，国防部长和高加索前綫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有的人都断言，不久就会有一个什么人“上台”；一部分人认为科尔尼洛夫將軍要上台，另一部分人认为布尔什維克要上台。我明白我是什么也搞不明白的，于是就到莫斯科去了。

这就是奥斯特仁卡……我認識这里所有的胡同、所有的招牌。起初我觉得这个城市还比較平靜；但这只是外貌——这里的人也同样是什么都不明白。我試圖寻找老相識。八年过去了，这不是一个短暫的时期。一个在一九〇七年曾經常出席我們的集会的中学生已成为一位时髦的律师；当我向他通报了我的姓名以后，他向我嚷了起来：“您太輕率了！呆在巴黎有多好，至少不会在街上

① 弗·索洛維約夫(1853—1900)，俄国反动的神秘主义哲学家。

吃流彈……”那个热爱萊蒙托夫的詩的中学女生柳霞成了一个生小胡子的胖太太；她請我喝茶，但她的埋怨却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她不停地叨咕买不到糖，僕人頂嘴，夜里不敢上街。

特維尔大街上有一家設有紅絲絨沙发的“钟声”咖啡馆；那里有咖啡和甜点心出卖。作家們常去光顾。我在那里結識了弗·盖·李定；他面色紅潤、衣著十分整洁；他談到馬，談到馬廐，談到布宁的創作技巧。鮑·康·扎伊采夫亲切地描述东正教仪式的优美，还談到了小說。弗·法·霍达謝維奇無論談到什么人都那么尖酸刻薄，他还写一些情詩，詩中說他就象姑娘們到了晚上想睡觉那样想死；他的臉很象一个头骨。阿·尼·托尔斯泰阴郁地叨着一只烟斗对我說：“糟透了，什么也弄不明白。所有的人都瘋了……”

阿列克賽·尼古拉耶維奇肯定地說，我象一个墨西哥的苦役犯。有一次，我跑到阿尔巴特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在写些什么；一个姑娘走到我跟前，生气地收起了空杯，并說：“这里不是您的大学……”我对俄国的風俗人情已很生疏，常常出乖弄丑。我觉得我之所以不能理解目前所发生的許多事件的意义，其原因正在于此。但是阿列克賽·尼古拉耶維奇的迷惘也并不比我輕。不久以前我重讀了布洛克的日記、柯罗連科的书信、高尔基的論文；当时他們都有所接受，也有所拒絕，有所贊同，也有所

抗議。顯然，“墨西哥的苦役犯”一經檢驗原來是一個平凡的俄國知識分子……我提起此事不是為了懺悔或申辯；我只是想說明我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處境。當然，現在我看得清楚多了，但是這裡並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東西——事後的聰明是人人皆有的。

2

有人說，從樹木後面看不見森林；這同從森林的後面看不見樹木是一樣正確。在閱讀一七九三年的法國歷史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國民議會、正直不阿的羅伯斯庇爾、革命廣場上的斷頭台、無褲黨人發表演說的俱樂部、抨擊政敵的小冊子、陰謀、戰鬥。就在這一年，菲利浦·列彭正在實驗室里研究瓦斯；塔爾瑪正在排演偽古典主義的悲劇；追求時髦的女人正在試戴飾有緞帶的新帽；而家庭主婦們正在城里東跑西顛地尋找不知去向的食品。

阿·尼·托爾斯泰曾對一九一七年夏天人們的談話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們是不是要完蛋？俄羅斯是不是還存在？知識分子是將被宰殺或者我們還能保全生命？”另一個說：“去你的吧，我的老兄，干嘛要宰殺咱們，胡說八道，我不信，可是食品店是要被毀掉的。”第三個根據可靠的消息宣稱，“全城的人都將死於飢饉”。

我的莫斯科的朋友們偶然地把我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間所写的一本筆記保存下来了。筆記写得非常簡要，以致使我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它們的意思；但是有一些字句却帮助我回忆起許多往事。我也記下了同瓦·亚·布柳索夫的第一次会見。

这正是托尔泰所描写的那个夏天。我在瓦列里·亚可夫列維奇家里呆了几个钟头。他向我朗讀了他在不久以前写成的一首关于阿丽安^①的詩，我們还爭論了一番。如果把这一部分的談話用适当的字句表达出来，那它对于一九一七年的八月将显得极为突然：

1. 当泰西把阿丽安遺棄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島上以后，他果真受到了良心的譴責嗎？

2. 怎么写比較正确——“泰西”还是“費西”？（瓦列里·亚可夫列維奇坚持后一种音譯。）

3. 一个現代詩人是否有必要去写泰西的故事？（我說不必要。）

可能有人說，布柳索夫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形式主义者，一个坚决把自己的天地和现实对立起来的頑固的頹廢派。这是不正确的；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当他的同輩和比較年輕的一代詩人（包括我在內）都还在莫名其妙、輾轉不安、为許多事物悲悼、憤慨的时候，布柳索夫就已

① 阿丽安是希腊神話中克里特王米諾斯之女，她曾用小綫团帮助雅典英雄泰西逃出迷宮。

經在最早的蘇維埃機關里供職了。他同我談到泰西，那是因為他相信詩歌的生命力并尊重自己的工作。他一輩子都生活在書中——別人的和自己的。他在青年時代有一次曾坦白承認，他“對小說有一種糊塗的敏感，但對生活中的事件卻完全麻木”。我去找他時候懷着一種雙重的感情：我記得他寫的信，他曾不止一次地鼓勵我，我尊敬他，但他的詩我却早就不再喜愛，同時我又耽心我會沉不住氣，會在無意之中得罪我非常感激的一個人。

瓦列里·亞可夫列維奇住在梅辛斯克一路；要去找他就必須穿過著名的蘇哈廖夫卡廣場。如果梵蒂岡在羅馬是一個獨立國，那麼蘇哈廖夫卡廣場在一九一七年的莫斯科也是這樣的一個獨立國；它既不聽命於臨時政府，也不服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又不接受民警局的管轄。在宏偉的市場上空高矗着一座美麗的高塔；那個擁有唱悲歌的盲人、乞丐和基督教的苦行僧的古代羅斯仿佛還在這里生活着。粗野的咒罵常被哭訴聲打斷，在人們按照古習指着上帝發誓的時候也常常插進去一些關於“克倫票子”、資產階級、布爾什維克的談話。这里有各式各樣的人物：逃兵，來自郊区农村的肥胖的农妇，失了业的家庭女教师，女管家，寄人篱下的食客，举止端庄的官太太，慣窃，卖零支烟卷的鼻涕滿面的小孩，挟着咕咕咯咯叫个不停的母鸡的牧师。一片喧囂聲、咒罵聲、吆喝聲、跺腳聲——這是一個人的大海……

“亚当哭了起来：我的天哪我的天！”一个瞎子用难听的鼻音說道；当我走到布柳索夫家門口的时候，他的歌声依然在我的耳朵里响着。苏哈廖夫卡广场是一篇必不可少的前言，是一把識破那被称为“瓦列里·布柳索夫”的复杂现象的钥匙；要知道，虽然那些描写泰西、阿薩尔加頓和庫庫尔坎的诗作的价值还值得爭論，但是任何人都不会否定布柳索夫在俄国文化发展中的意义。（瓦列里·亚可夫列維奇有一次曾写道：“但愿我不是‘瓦列里·布柳索夫’”；然而布柳索夫是布柳索夫，这毕竟是一件好事。）

当然，有权充当前言的不仅只有一个苏哈廖夫卡广场；我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布柳索夫住在它的附近；可以想得起来的也許还有扎里亚吉耶和那儿的粮店、“自由美学协会”、中国城、收购沒沒无聞的毕卡索的油画的商人休金、大德米特洛夫卡的“文学艺术小组”。（当小组里的那些既不懂科学又不懂詩却也怡然自得的成員們正在玩文特的时候，瓦列里·亚可夫列維奇在那里鼓吹过“科学詩”。）布柳索夫穿着欧式的衣服，懂得几种外国語，写信的时候常常使用一些法語詞汇，墙上挂的不是馬科夫斯基的作品，而是罗普斯的作品^①，但他却是既稳重又莽撞、既冒失又机灵古老的莫斯科的产物。

他对劳动的热爱和充沛的精力使所有的人都很吃

^① 馬科夫斯基(1846—1920)，俄国现实主义画家；罗普斯(1833—1898)，比利时版画家，有些作品具有色情和神秘的色彩。

惊。在我现在所叙述的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愤怒地反驳我对诗歌创作的那种如他所說的“不負責任的”态度：“灵感有什么关系？我每天早晨都写詩。不管我是否願意，我都要在桌子前面坐下来写。即使沒有写出詩来，我也要寻找新的韵脚，练习艰深的詩格。这就是我的草稿，”——于是他就把巨大的写字台的几个盛滿了手稿的抽屉拉了出来。他責怪我輕浮，不認真钻研；他說需要为詩人們創立一所高等学校：这是一种手艺，虽說是“神圣的”，然而它也需要訓練。

他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組織者。他的父亲做軟木买卖，因而我深信，如果布柳索夫在年輕的时候沒有在偶然中碰到魏倫和馬拉麦的詩作，那么在我們这里就会象在埃斯特雷馬杜腊那里一样长出一片木栓櫟的树林。工作能力和虛荣心他兼而有之。他在二十岁的时候曾在日記上写道：“才能，甚至天才，如果能使人成功，那也是很慢的。这太不够了！我是不滿足的。應該選擇另一条途徑……應該在迷雾中找到指路星。我看見了这颗星：这就是頹廢文学。不錯！不管你說它虛伪也罢，可笑也罢，它依然在前进、在发展，而且未来也将是屬於它的，特別是当它找到了一个当之无愧的領袖以后。而这个領袖就是我！是的，我！”

他办出版社，办杂志，撰写論詩的著作，翻譯古羅馬作家的作品，和公认的权威爭論，教导年輕人；他只耽心

一点——落后于自己的时代。

他常常喜欢描写混乱——这是从丘特切夫那里学来的；但是布柳索夫想把他所歌颂的混乱拿过来并进行一番整顿。我还记得一九二〇年年末我到一所小宅邸——教育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管理文学事业的部门——去找他的情形。瓦列里·亚可夫列维奇以部门首长的身份和我谈话，表示愿意给我一个工作；他指了指墙壁，那里挂着一幅古怪的图表：有正方形、斜方形、角锥体——文学事业的图表。它很朴素，同时也很雄偉；他是一个把诗歌变成办公机关、又把办公机关变成诗歌的白发魔术师。

他常常被人称作纯理性主义者、一个只有干巴巴的理性的人；许多人肯定说，他从来不是一个诗人。依我看，这不对：对于布柳索夫说来，理性不是一种合理的思想，而是一种迷信，他对理性的信仰已陷于极端。他作为一个诗人，那是就这个词的最平常、最庸俗的意义上来说的：他生活在由许多疯狂的图案构成的一个假想的世界中。弗鲁贝尔^①给他画了一幅出色的肖像画：一对严厉无情的灼人的眼睛，一颗仿佛被人从后面砍了下来的脑袋。

我想起了一九一八年莫斯科的“诗人咖啡馆”。常到那里去的都是一些和诗歌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投机商人，太太们，自称为“未来主义者”的年轻人。瓦列里·亚

① 米·亚·弗鲁贝尔(1856—1910)，俄国具有颓废色彩的画家。

可夫列維奇宣稱，他要以這個咖啡館的顧客所提供的題材寫作一些即興的三韻句詩。他收到了一些荒謬可笑的短簡。他仿佛既沒有看到那些喊叫着“兩杯咖啡，兩杯！”的侍者，也沒有聽到醉意蒙矓的水手們的笑聲。他嚴肅地、莊重地讀着詩；他朗誦詩時的声音很奇特，——一種刺耳的、斷斷續續的声音，而且總是仰着頭。他宛如一個馴獸者，只不過在他面前的不是馬戲團的獅子，而是詞句。他的三韻句詩有的描寫克麗奧佩特拉，有的描寫一個坐在小桌旁的小姐，有的描寫未來的透明的城市。

他對所有的人都很嚴肅；他的情詩有點象阿芙洛迪特王國的旅行指南。由於詩人們的包圍，由於被神秘的情緒所支配，他開始研究“通靈術”，他知道求神問卜和測字算命的一切特點，知道許多咒語和中世紀的占卜術。

當未來派出現以後，巴爾蒙特天真地請求他們把推翻他的時間再推遲一些。布柳索夫試圖親自出馬來推翻他；他寫了一首名叫《一個未來派的晚會》的詩。馬雅可夫斯基寫道：“在街道上的許多太陽的背后，一輪誰也不需要、萎靡不振的月亮在某處一癩一癩地行走。”布柳索夫有這樣一句詩：“高掛在煙囪上空的月亮，就像一枚鑄造得很蹩腳的硬幣。”但是未來派並不承認他是他們的人，而且在他們的口號中還有這麼一條：“從布柳索夫的黑色燕尾服上剝下紙糊的鎧甲。”

瓦列里·亞可夫列維奇在法國發現了不大為人所知

的詩人，“科學詩”的發明者雷涅·基爾。布柳索夫很欣賞雷涅·基爾的論斷：瓦列里·亞可夫列維奇早就想當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魔法師，一個術士兼院士。

他研究普希金，論述折字法、重複謂語省略法、預期的敘述法、一筆雙敘法，他作了一個統計，在《奧涅金》的第三章里有百分之七十三的韻腳都具有一致的前重音，而在第四章里總共只有百分之五十四。布柳索夫試圖完成《埃及之夜》，創作一篇新的《青銅騎士》；但是他的這些作品我是不想再讀一遍的。

有些人非難布柳索夫缺乏審美感，這是不公允的：這個特點是一切象徵派所固有的——顯然，他們的審美感就是如此。他們幾乎全都贊賞那些在我們看來簡直是庸俗作品的典範的伊戈爾·塞維梁寧的詩作，這豈不是很奇怪嗎？布柳索夫在他去世前不久能夠寫道：“我是一個中間派。我和上面那些人相同，在貴族的集會上我就是一個貴族，我用每一口呼吸、每一根神經來響應上流社會的精神。”我現在想到了象徵派的詩。這是一種極為出色的現象；偉大的詩人亞歷山大·布洛克誕生了；俄羅斯的詩歌仿佛獲得了解放。但是我覺得，比起布柳索夫的日記、巴爾蒙特的旅途隨筆或布洛克和安德烈·貝雷的通信來，契訶夫的书信以至他的那些晦暗的衛星們的书信要容易理解得多！

理性引導布柳索夫接受了革命；他看見了明天。他